

新发展格局下的 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研究*

凌永辉 刘志彪

摘要:构建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要从价值创造、产业创新、时间及空间等多维度进行切入,促进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其中,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机制原理可以在宏观层面概括为以产业集聚为核心的循环动力机制,在微观层面集中体现在协调机制和信息机制共同作用下产业链节点的动态竞争。

关键词:内需 产业链循环 双重追赶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1)06-0052-08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1.06.0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于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出口拉动下的“增长奇迹”。图1描绘了这一增长轨迹,从中可以看到,进口规模几乎与出口规模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而且在进出口规模扩张的贡献下,经济总量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这当中,产业链循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原材料、专业化设备大量从国外进口,加工组装成最终消费品后再销往国际市场,“大进大出”模式下,国内市场循环与国际市场循环存在分离,内需型产业链循环的发育不成熟。

然而,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国际市场需求陷入持续低迷时,基于外需的产业链循环出现脱节。这一现象对国内乃至全球的经济结构造成冲击。特别是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使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均认识到依靠外需所发展起来的产业链循环的不稳定性,因而中国经济亟需转到基于内需市场培育和发展产业链循环,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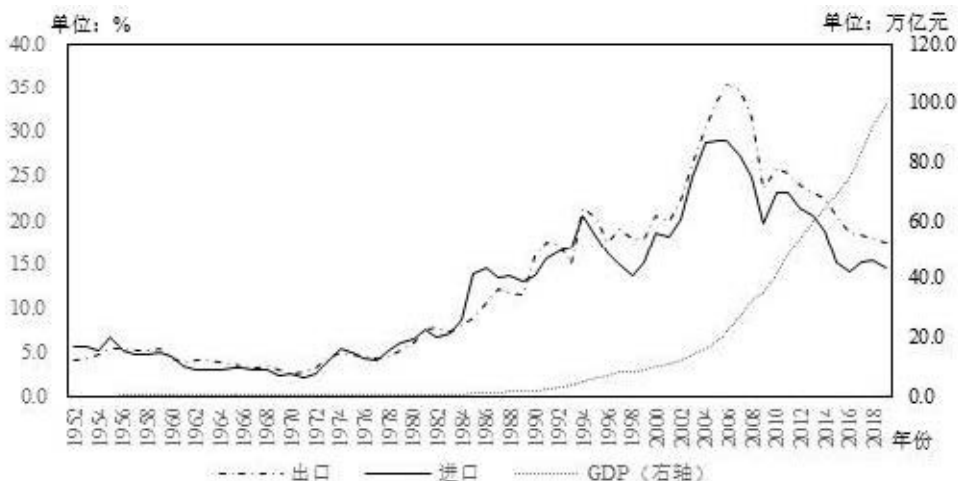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进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绘制。

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产业链竞争对一个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而言,其重要性愈来愈突出。譬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产业竞争呈现为纵向垂直分离下的产业链条环节竞争,容易发生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被锁定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现象,当发达国家对关键零部件“卡脖子”时,这些本土企业往往就会出现产业链断供风险。截至目前,学界对产业链及产业链循环的研究虽然较多,但从产业链及其循环的基本内涵来看,不少研究将其与供应链的概念混用,且较多地出现在实务部门对某一具体产业案例的直观分解上,如供应链管理研究^{[2][3]}。本文引入内需驱动效应,提出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概念,并从理论角度进行了详细探讨。

二、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理论内涵

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研究中经常用到的重要概念,从投入产出联系的角度来看,它指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客观形成的某种技术经济联系^[4]。显然,产业链是一种上下游的单向“链条”关系,包括了从原材料投入到包括中间

品在内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终端产品流通与销售等环节。然而,产业链循环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双向“链环”关系,即基于市场形成产业链,通过产业链的发展又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螺旋式增长的过程。可见,产业链循环是从产品和劳务的最终需求角度对产业链进行的观察和分析。根据最终需求究竟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的区别,产业链循环又可以分为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和外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就是要依靠国内有效需求来驱动产业链循环过程,即基于国内市场发展本土企业主导的产业链,进而促进国内市场进一步增长。

从学理上说,中国的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必然绕不开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问题。中国经济过去长期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进行代工生产,但却没有实现 Gereffi 所预言的从“进口零配件装配→注重整个生产过程→自主设计产品→销售自主品牌产品”的自动产业升级^[5]。这当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就市场追赶而言,发展中国家从事的生产环节大多属于国际代工和贴牌生产,而这些部门基本上都是标准化和同质性的,产品市场相当饱和,甚至存在过度竞争。这就决定了这些本土代工厂很难

获取边际成本之上的边际利润,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进行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的直接竞争。即使少数的本土企业试图发展自主品牌,多数情况下只能实现全球价值链中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对于更高级别也最为关键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则无疑遭到了发达国家的扼制和阻击^{[6][7]}。其二,就技术追赶而言,一个企业是否愿意进行自主创新,内生于企业自身的理性选择。在一定的市场环境和财务约束条件下,如果自主创新的风险和成本远远高于国际代工生产,那么企业显然会理性地选择国际代工生产。尤其是在不能利用内需引致的本土产业链循环的情况下,企业选择自主创新从而实现技术追赶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一项针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深入研究发现,对于那些非创新型企业来说,任何研发(R&D)费用的增加都会导致更慢的企业增长,从而提高企业破产或被兼并的风险;对于那些创新型企业来说,如果企业增长较慢,则更倾向于购买现成的专利,而非进行自主创新^[8]。因此,中国当前要转向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发展和利用,本土企业需要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实现市场追赶和技术追赶。为有效认识这一追赶过程,从价值创造、产业创新、时间及空间维度进行分析。

首先,从价值创造的维度来看,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与本土企业的市场追赶密切相关。所谓价值创造,就是指产品或劳务在产业链循环中的价值实现过程。在给定市场份额的前提下,价格和产出决定总收益,从中扣除现时成本的剩余就是企业所生产和经营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增值。如果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大,那么就会通过两种效应增加价值创造。一种效应是垄断效应,即随着市场份额扩张,企业的市场控制能力就会增强,有利于增加总收益;另一种效应是成本效应,即利用市场份额增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

降低了单位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由于内需市场的本土企业与消费者的邻近特点(既包括地理空间邻近,也包括文化习俗邻近),便于本土企业更加敏感地获取消费者需求的信息,从而将包括产品体验、信息沟通等在内的交易成本尽可能地降至最低,同时也便于本土企业使用更低的运输成本将产品送达消费者终端。可见,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体现了本土企业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实现市场追赶的本地化优势。

其次,从产业创新的维度来看,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与本土企业的技术追赶紧密相连。过去大量的本土企业选择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行代工,这些企业在盈利的同时,往往陷入“国际代工依赖→盈利能力有限→自主创新受限”的困境。因此,本土企业要实现自主创新,其关键就在于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本土企业可以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增加自主创新所需的利润积累。就需求规模效应而言,本土企业更倾向于在国内市场中对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等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产生规模经济以提高企业利润。尤其是对于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资产专用性的创新产业,如果国内市场规模较大,那么这些企业就更愿意做出风险偏好的决策。Schmookler对19世纪美国的炼油、合成纤维、玻璃、烟草、铁路、纺织等产业进行分析后发现,国内市场需求扩张会显著拉动投资增长,进而促进专利数量以及专利带来的利润的大幅增加^[9]。就需求结构效应而言,由于本土企业对国内市场更加熟悉,因而更易于挖掘利基市场(niche market)、领先用户(lead users)等市场特征,进而促进盈利能力的提升,而且相对于内需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对盈利能力的影响更具有长期延续性。这是因为,在内需引致型产

业链循环中,利基市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通过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调整本土企业的关注焦点和优先发展顺序,正如Porter所指出:一些预期收益高、前景好的产业环节会优先得到企业的关注和发展,而利润较低产业环节,无论是产品设计、制造还是市场营销,都将延后发展^[10]。因此,领先用户对产品的领先需求往往能够引导本土企业挖掘潜在的市场,一旦这些企业掌握了领先用户,就将拥有先行者优势且最有可能成为其行业规则的制定者,进而获得垄断利润。

再次,从时间维度来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下的产品差异化是本土企业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实现市场追赶的重要策略。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产品引入期对企业实现市场份额的追赶至关重要^[11]。在这一时期,如果新进入者的产品设计跟市场在位者的已开发产品同质,那么由于消费者需求受到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新进入者除了让渡部分利润,实行低价策略外,将很难获得必需的市场份额。如果新进入者的产品设计与在位者已开发产品具有较大差异,那么在投入一定程度的营销努力之后,就有可能获得消费者认同并扩大市场需求的份额(既包括全新的消费者,也包括从其他品牌转移过来的消费者)。因此,产品差异化策略实际上是新进入企业避免与在位企业形成直接的产品竞争的经营策略。特别是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本土企业往往直接面临终端需求,甚至是一些个性化定制需求,这就要求这些企业的产品必须具备一定的差异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标准化的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当一个企业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一些独特的产品,且这些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又不仅仅是通过低价来体现时,这个企业也就获得了与竞争企业相比的差异化优势^[12]。也就是说,产品差异化策略允许企业或收取高价,或在给定价格上出售更多

产品,或在经济周期性低迷时培养起自身的消费者忠诚度。

最后,从空间维度来看,在产业集群中形成真正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是本土企业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实现技术追赶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东南沿海的发达省市,还是在中西部欠发达省市,均建立起了各类产业园区、工业集聚区,以及“飞地经济”等产业集群模式。然而,我国产业集群在发展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微观上突出地表现为与本土企业的投入-产出联系不强,集群企业未能形成真正的竞合关系,许多本土企业甚至为了争夺国际大买家的订单而进行恶性竞争,极大地损耗了经济资源。譬如,很多产业(特别是技术创新密集型产业)集聚区的专业设备供应、市场服务供给等都是由国外跨国公司所提供,造成产业集群与本土产业发展之间相互割裂;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一些产业集群政策的过程中,出于对GDP等指标的考虑,往往是为了引资而引资,容易忽视产业集群与本土企业间的产业关联。但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产业集群则有利于本土企业形成真正的竞合关系,这主要是依靠产业集群中的专业化市场来实现的。一方面,专业化市场本身就具有供应商卖方交易和采购商买方交易的双边市场效应。这意味着在卖方市场上,专业化市场中的企业既可以选择国外采购商也可以选择国内采购商,从而避免被国际大买家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同时在买方市场上,专业化市场中的企业可以利用多样化的国内需求,进行一定程度的自主研发和品牌创造。这样一来,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产业链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市场是政府与市场协同的平台机制,有利于解决过度竞争等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可以对专业化市场的交易和竞争秩序进行合理规制,通过对知识产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提

供保障等措施,有力地推动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本土产业集群形成竞合优势。

三、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市场边界与机制原理

(一) 市场边界

中国是典型的大国经济,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是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根本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市场边界只能限定在国内市场范围。根据新经济地理学所提出的国内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内需规模较大的国家通常也是净出口国^[13]。可见,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不仅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且还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因此,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那些有着较大市场份额的生产部门,在国内市场效应下能够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获得新的成本优势,在吸引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向国外市场渗透。随着全球化市场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产品、服务、要素等在国际间的流动极为频繁,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也不可能“闭关锁国”的情况下畅通地运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大国内需和经济全球化都是实现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条件。

更重要的是,产业链竞争与经济全球化以及微观产业分工密切相连,包括产品内贸易、离岸外包、垂直专业化等多种微观企业跨国经营模式。产业链竞争是指企业从外围部件的价值链跨越到核心部件的价值链,但这一过程需要技术创新的大量积累才能实现,尤其是要吸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要素为己所用,形成“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14]的创新格局。事实上,中

国一些重装备工业的成功实践已经表明,产业链竞争背景下本土企业真正的自主创新,必须要在开放经济中基于内需而发展形成。近些年来,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演变趋势大致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一是部分产业链环节回归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母国;二是在部分产业链环节从中国分散到东南亚、拉美的发展中国家;三是在大国边境线周围形成邻近国家的区域一体化集聚。这种经济全球化演变趋势,一方面突出反映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国际竞争范式转型过程中重视产业链安全性的价值观回归,另一方面也表明全球化分工并不会终结。因此,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市场边界同时涵盖了产业链竞争的技术层面和安全层面,面向的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 机制原理

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机制原理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考察。在宏观层面,由于大国内需具有国内市场效应,因而能够吸引现代部门(即那些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差异化产品的部门)在国内市场形成产业集聚,而且,随着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水平提高(如消除市场分割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下降等),高级生产要素在自由流动性增加的情况下更容易向优势区位进行集聚,或者在历史偶然因素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产业集聚区。也就是说,国内统一大市场显然会导致更加强烈的现代部门产业集聚效应。实际上,在中国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中,迂回生产链条可以广泛延伸,创造可观的中间产品需求,并进一步促进国内市场效应下的现代部门形成产业集聚带来显著的本地化知识溢出效应。产业集聚中的个体可以通过联系交往进行思想交换和知识创造,但即便在互联网通信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知识溢出和创造活动仍然受限于地理空间范围。这是因为

在更大的范围内,知识拥有者对传播知识的意愿会下降,同时知识接受者对吸收知识的能力也会削弱^[15],从而导致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本地化特征^[16]。在这种本地化的知识溢出效应下,现代部门的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由此导致的内生创新增长动力就越明显,从而有助于提升国内市场的整体生产率水平。换言之,现代部门的产业集聚反过来也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增长。因此,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在宏观层面的机制原理可以概括为以产业集聚为核心的循环动力机制。

在微观层面,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不是静态固定的,而是在不同环节都存在着动态竞争^[17],这是使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维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原因。其中,两种具体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协调机制。由于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中的企业活动是高度专业化的,而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因而产业链的组织机制就可以视为一种长期的关系性合约。组织机制中,关系专用性投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种专用性投资会产生锁定效应,由此产生的合约就决定了双方报酬分成,这也就是所谓的剩余控制权^[18]。供应商和采购商围绕剩余控制权进行讨价还价,形成产业链关键节点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有助于打通产业链堵点、连接产业链断点;内需市场作为关系性合约嵌入的社会关系制度因素,由不确定性引发的扭曲程度会低于国外市场,对于本土企业而言,在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节点控制和竞争中独具优势。二是信息机制。通常情况下,在供应商和采购商的合约关系中,事前合约双方均不清楚对方传递的信息是否值得信赖,而只有在事后才能通过对方履约情况进行判断。这就凸显了经验的重要性,也即动态的声誉作用(比如,品牌忠诚度就是声誉的一种表现),其中既有信号的传递又有信号的甄别。声誉作用的发挥,也依赖于供应商或采购商投入专用性资产,并且

这些投入能获得一定的回报。这一过程自然涉及市场风险,而本土企业对国内市场的熟知程度有助于其降低风险预期,增加建立和维持声誉信息机制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推动国内市场跨越临界点进入高质量供给区间,从而进一步巩固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

四、政策建议

第一,从需求角度来看,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国内居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规模和改善国内需求结构。目前,我国超大规模内需尚未真正转化为有效的现实需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收入分配结构不够完善,具体表现为消费需求比重偏小而投资需求比重偏大、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偏低、乡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消费需求差距较大、居民消费需求中的服务性消费比重偏低等四个方面。通常而言,提高居民收入,可以从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两个方面共同发力,前者是创造财富、增加财富总盘子的活动,后者是分配和再分配财富的活动。因此,一方面需要努力使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适当高于平均工资的上升幅度,从而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能够持续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职能优化转型,将职能重点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到公共服务优化上来,增加教育、医疗、养老、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支出,从而“垫高”居民消费支出。其中,尤其需要尽快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推动从需求侧打通产业链循环的堵点。特别是在当前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多种组合政策,完善需求侧管理,提振国内消费。

第二,从供给角度来看,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国内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国内产业供给水平和产品质量。实际上,供给体系决

定了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能力。我国建立起了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的产业体系,但由于一些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产品等存在供给瓶颈,很容易遭到发达国家“卡脖子”,不利于国内产业链顺畅循环。在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因此,我国当前要基于国内市场来发展和畅通产业链循环,关键还是在于以提升国内科技创新能力为突破口,努力补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供给侧断点。以产业创新为例,应积极探索和试点科研成果按照市场规律实现高效率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如加强基础领域研究、创新人才培养等),鼓励有条件地方依托产业集群进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鼓励有实力企业采用纵向并购科研院所的方式加速科研活动的商业化过程,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相互融合。

第三,从宏观市场层面来看,要促进要素实现市场化最优配置,优化国内区域经济格局和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并以此为依托和载体来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要素按照市场原则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自由有序地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进行快速流动,是产业链需求端与供给端形成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必然要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已经发育得较为充分,基本上已经消除了阻碍商品自由流动的非自然因素。但是在要素市场中,行政干预等造成市场扭曲的因素仍广泛存在,如对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的行政垄断和干预,导致一些企业和部门盈利远超实体经济部门,进而诱导社会资金大量涌入和助长经济泡沫。这种虚实经济结构失衡是导致我国产业链水平不高、循环

不畅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要素自由流动也是优化区域经济格局和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基础。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求加快破除行政垄断和干预的体制机制,消除各种行政性市场分割现象,促进生产要素能够按照市场原则自由进入或退出。

第四,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要按照所有制协同发展的要求,大力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鼓励民营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进行兼并、收购经营活动,培育本土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我国民营企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在九成左右,理应成为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主体。为此,应加强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氛围和企业家精神,尤其是要强调民营企业家的决策独立性、地位平等性,同时也应注重发挥我国的所有制协同优势,促进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和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在动态竞争中形成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良性关系,使这些微观市场主体成为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的内在动力源泉。当然,强调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并不是要否定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而是要着力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均衡调节机制。譬如,积极探索由政府牵头负责、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链长制”管理制度,围绕重点产业的“链主”企业布局产业链延拓和创新,这很可能是实现市场和技术双重追赶的有效途径。

注释: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8月27日,第01版。

[2]Mentzer J. T., Dewitt W., Keebler J. S., MIN

- S., et al. Defin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2001, 22(2): 1-25.
- [3]赵晓敏、冯之浚、黄培清:《闭环供应链管理——我国电子制造业应对欧盟 WEEE 指令的管理变革》,《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8期。
- [4]刘志彪:《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9年第12期。
- [5]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1): 37-70.
- [6]Gibbon P., Bair J., Ponte S. Governing global value chains: An introduc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 37(3): 315-338.
- [7]张杰、郑文平:《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 [8]Odagiri H. R&D expenditures, royalty payments, and sales growth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s.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83, 32(1): 61-71.
- [9]Schmookler J. *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10]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 [11]Vernon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0(2): 190-207.
- [12]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13]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950-959.
- [14]刘志彪:《战略理念与实现机制:中国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
- [15]Prager J. C., Thisse J. 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unequal development of reg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2.
- [16]赵勇、白永秀:《知识溢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 [17]凌永辉、刘志彪:《横向竞争视角下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变动及产业升级》,《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 [18]Grossman S. J., Hart O. 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4): 691-719.
- *基金项目: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建设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2021年度研究课题“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扩大内需效应研究”。
- 作者简介:凌永辉,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93;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 (责任编辑:邓颀)